

民国传奇

《南方周末》编著

◎ 民国初建

◎ 留苏密档

◎ 血泪辛酸

◎ 尘封往事

◎ 行宪之乱

◎ 学界·文人

南方周末文丛

南方周末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折时期，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下层革命。可以说，这是少数英雄崭露头角的时代，也是启迪民智、民主意识觉醒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磅礴气势。

AN UNOFFICIAL ARCHIVES 1912-1949

南方周末
文丛

南方
周末

民国传奇

《南方周末》编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传奇 / 《南方周末》编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5

(《南方周末》文丛)

ISBN 978-7-5391-7661-1

I. ①民… II. ①南… III. ①中国历史—民国—通俗读物

IV. ①K25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627号

民国传奇

《南方周末》编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6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661-1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20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86524997

《南方周末》文丛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王更辉

主 编

黄 灿

编辑委员会成员

王更辉	黄 灿	陈明洋	伍小峰
毛 哲	朱 强	向 阳	邓 科
吴志泉	史 哲	肖 华	朱红军
张 英			

执行主编

张 英

目 录

民国初建

回望百年共和路——袁伟时教授访谈录	笑 蜀.....	二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	范福潮	一〇
“民国产婆”赵凤昌	范福潮	十九
宋教仁之死：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	朱宗震.....	二八
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	范福潮	三八
陶成章案与光复会的灭亡	范福潮	四四
《临时约法》为何成废纸	范福潮	五二
有计划的死：梁济对民初共和体制的失望	罗厚立.....	六〇

留苏密档

1923年，蒋介石的苏俄之行	黄道炫	七〇
俄罗斯密档：重绘青年蒋经国	谢忠良 王健民 童清峰	七五
预备党员：蒋经国	志 高	八二
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	王彬彬.....	八七
也谈瞿秋白与米夫之间的斗争	瞿 巍.....	九六

血泪辛酸

1922 年的陈炯明与孙中山	叶曙明	一〇〇
叶德辉之死真相	谭伯牛	一〇七
曾志与夏明震	陶斯亮	一一七
吴佩孚的复杂人生	李 洁	一二一
卢作孚之死	卢国纶	一三二
“书生论政”的悲喜剧	邓兰丽	一四〇
北中国的自由“孤岛”——燕京大学抗战写实	笑 蜀	一四七

尘封往事

张申府：中共黄埔第一人	李 扬	一五八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哪里	王学泰	一六三
吕正操眼中的张学良——访吕正操传作者方小宁	万 静	一六五
东北青帮访日代表团始末	孙 江	一六九
导致“西安事变”的个性冲撞	朱宗震	一七三
蒋介石曾令秘密研制原子弹	唐 人	一八〇
打入汪伪政权的抗日特工	何 蜀	一八七
汪精卫见溥仪	王彬彬	一九〇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缘何失利	倪乐雄	一九三
现场 1945：台湾光复前夜	杨 渡	一九八
“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 ——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杨天石	二〇八
豪杰—圣贤—真命天子 ——评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朱宗震	二二〇
蒋介石如何指导蒋经国读书学习	曾景忠	二二五

行宪之乱

“人权为宪政基本”

——张君勱在上海青年会的宪法演讲 程巢父..... 二三六

国民政府行宪之初的选举纠纷 程巢父..... 二三九

蒋介石对 1948 年行宪的“反省” 朱宗震..... 二四五

学界·文人

国器章太炎 罗厚立..... 二五四

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 罗厚立..... 二六二

张伯苓是怎样办南开的 李冬君..... 二七〇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学学费 陈明远..... 二七八

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 庄森..... 二八二

陈独秀与胡适 水梦云..... 二八九

张东荪的风雨人生 黄波..... 二九二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港穗因缘

——《陈君葆日记全集》史料大披露 周佳荣..... 二九八

我们三个朋友：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 樊洪业..... 三〇八

胡适、鲁迅与陈德征 王彬彬..... 三一九

一位犹太女子写给胡适的情书 耿云志 韩荣芳..... 三二二

胡适的经济生活 陈明远..... 三二八

文人原来是“密使”——曹聚仁与两岸谈判 韩三洲..... 三三六

胡政之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前后 王鹏..... 三四〇

谈钱钟书先生的一则考证 钱定平..... 三四三

民國初建

回望百年共和路

——袁伟时教授访谈录

◎ 笑 蜀

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也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民主应包容多元，尊重各方利益

笑蜀（以下简称“问”）：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总结，一个是革命党人自身的缺陷，一个是我们民族本身的缺陷，正是这两种缺陷导致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短命，造成中国民主之路的百年坎坷。

袁伟时（以下简称“答”）：民主共和其实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鸦

片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鼓吹民主共和，可惜他们的言论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王韬、郭嵩焘，特别是郑观应都主张改革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要有议会，要办报纸，要言论自由，要办新式学校，这些他们都讲到了。

问：无论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遗憾，但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了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答：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确实是空前的，但危机也同时潜伏下来了。这里的危机一个是财政危机，一个是制度上的硬伤。首先说财政。革命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问：各省都不给中央政府上缴税款？

答：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要养民军。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大量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民军，仅广东就有民军14.8万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增加了3倍半！这就惨了，拿不出钱来上缴给中央政府。到了熊希龄上台，中央财政还剩下多少钱呢？9万元，不如一家公司的资产多。到这种地步，只能借外债，结果闹出一个善后大借款。

问：政府在财政上完全破产。

答：对。更大的危机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互相制衡的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末革新势力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没有互信基础，对袁世凯不放心，老是想怎样仍然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上。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掣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不平衡就必然冲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招揽和重用海归派，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很能干，很勤政，也很有抱负，不

可能接受国民党设计的这种一权独大的制度。

问：就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

答：对。这是袁世凯的一个罪恶。袁世凯有两大罪恶，另外一个称帝。1913年3月20日，还差半个月满31岁、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用手枪解决政治角力，这是民主共和的挫折。不过，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不幸，解决这一罪案的正确途径没有被国民党接受，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于7月12日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在民主共和的基本框架建立后，继续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先例。

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观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过程包括政党本身的运作和领导方式的变革，完成政党本身的民主化。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问：如你所说，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袁世凯也并非守旧，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敌人。当时袁世凯存在两种取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怎么对待袁世凯，怎么对待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关键人物，怎么引导他们向善，我认为民国初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希望双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容易两败俱伤，甚至前功尽弃，导致全面的复辟。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即革命成功后，旧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暂时掌握话语优势的新派，有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下为公的胸怀，能不能跟旧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达成妥协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

答：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但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没有现实的效力。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尽可能地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凶手抓到了，作为铁证的来往电报拿到和公布了，而且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赵秉钧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

问：法律之途尚未穷尽，就选择了枪杆子，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孙中山不搞“二次革命”，而是继续在法律上博弈，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

答：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水落石出，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会非常孤立。

问：不能把真相完全追出来，不能达到完全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会削弱袁世凯的权威，会造成一个弱势总统？

答：不一定弱势，但肯定是一个受到牵制的总统。他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他毒死了国务总理赵秉钧，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赵秉钧，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法律上博弈，虽然查不出元凶，但袁世凯会跟今天美国的杀人疑犯辛普森一个下场，纵然逃脱法律惩罚，但逃不掉道德和舆论的惩罚，要天天被人家唾骂，天天被舆论批评、督促，同时还有一个国会牵制他的行动，那么他后来要复辟帝制也就不可能了。

问：那么，多党政治、国会政治就可能持续下去，并有机会逐步成熟，中国也就不至于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沼？

答：这种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也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

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制度只是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问：我听到这样一种解说：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需要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而要建立文明国家。所谓文明国家是什么呢？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有民族特色、体现东方价值的制度。

答：制度要体现民族特色，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明确回答。邓小平有个主张，就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要有世界眼光，人家什么东西好，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就应该为我所用。根据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中国政府采取了几个步骤，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思维角度。什么步骤呢？其一是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签字。前一个公约全国人大已经批准生效了，后一个公约虽然有待全国人大批准，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说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批准；就是说方向坚定不移，只是需要创造条件。这两个公约涉及的是制度。另一个步骤是参加WTO。这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大变革，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一个大的变革，也是经济制度和法治的变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约束政府行为，使之遵守法治。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不同于整个世界的自己独有的所谓市场经济。以上几方面都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问：就是说，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固然差异很大，但同为人类，总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本需求是一致的，这些公约就体现了普世价值。

答：对啊。比如说非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跟欧美各个民族差异很大。但在基本点上，他们跟欧美各个民族应该是一致的，不能说因为他们是非洲人就可以不要个人自由，就可以不要男女平等，就应该被歧视、被奴役。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应该受到保障，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问：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民族特性可言，起作用的只能是普世价值。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技术层面，各个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体现普世价值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但跟着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还要不要民族特点、民族文化了？

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制度层面上尽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不等于不要民族特点，不要民族文化。民族特点、民族文化是私人的东西，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

政府当然也有责任。例如，保护文化遗产，确保文化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此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

问：你的意思是说，个人偏好可以有东西方之分，但制度只是个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答：对啊。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形成一个共同的制度结晶。制度就是规则，现代文明规则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对它需要敬畏，需要珍重。中国政府坚决参加 WTO，在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是非常明智的制度选择。

对法治的虔诚信仰是民主的根基

问：制度结晶或者说文明规则就好像一条大路，无以计数的人走了几千年，碰了无数次的壁，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才踏出来的。走这条大路最安全，最便捷，这已经是人类共识。

这里我想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怎么思考的？

答：应该承认，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他才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非常可贵的精神，但也有宝贵的教训。

一是空想。比如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就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非常准确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于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空想色彩同样突出，所以在民国初年无人理会，对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影响。

二是总想搞自己的特点。他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总想根据自己国家的所谓特殊情况，设计出一套不同于欧美并且远远驾乎欧美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设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

会实践作为基础，不是社会客观自然的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想象，闭门造车了。后来国民政府按照他的设想，搞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制，国民大会，军政、训政；机构上叠床架屋，制度漏洞很多，不但给后来的运作带来很多麻烦，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

三是不理解民主共和的真谛是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他在晚年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这也给蒋介石利用了，成为摧残公民权利、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问：革命党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理论准备不充分。一旦胜利猝然来临，革命党人无法尽快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规则体系来规范整个社会，其管理社会的能力受到强大质疑。

答：革命党人中，有过一些制度准备的是宋教仁。《临时约法》主要是宋教仁起草的。但宋教仁也仅仅是翻译过几部外国的宪法，包括德国的宪法，没有系统研究过现代政治学和法学。

问：法律是最讲实证的。这么重要的一部法律，差不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就靠宋教仁等寥寥几人差不多一夜之间赶出来，此前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调研，更没有公开听证和博弈。

答：没有。他们没有实证经验，没有对宪政问题做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就是一心一意想搞共和。

问：这跟国民党当时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国民党当时的内部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国民党当时还没有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

答：应该说正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完成从一个秘密的会党、秘密的革命组织向一个现代政党的转化。所以才有后来的中华革命党，才有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事件发生，而且这么做还理直气壮的。

问：实际上也不独孙中山他们如此。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气质的缺陷，我们还没有养成现代政治人格。

答：还有一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就是制度积累不够。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做司法总长，他就推行现代司法制度，建立新型的法院，改变原来的行政跟

司法统一的制度。结果呢，很多地方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没有那么多法官，或者法官的素质跟不上。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人，清末新政的时候才开始培养。1905年以后，相继有青年学生跑到日本去，上所谓速成政法班，学一点皮毛就回来，就当政府官员或者是建新式法院，但他们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行，结果建了新式法院以后，一般人反而觉得没有原来县太爷打板子公正，因为县太爷打板子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他有一套办法了，你现在废除旧的，新的接不上。没办法，只好放慢进度，撤掉一些边远地区的法院，恢复行政与司法统一的制度。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制度积累问题，没有制度积累你是做不来的。

问：辛亥革命是突变，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就那么五六年，那你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来支撑一个新的庞大的制度？人才准备不够，知识、经验准备也不够。整个社会都没有为这个突变做好准备。民主制度突然一下冒出来，各方面都没法适应，这就不免冲突。冲突的过程就是排异的过程。

答：归结起来可以这么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巨，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前的南北博弈

◎ 范福潮

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

辛亥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

刘承恩是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早在袁世凯来鄂之前，他就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转达袁“和平了结，早息兵事”之意。两信未复，九月十一日，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第三封信，仍未回信。袁世凯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这才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